

小草新编

李焕乾 著

公元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小草新编

目 录

代 序

感受益多情愈深 (1 - 28)

第一部分

小草诗稿 177 首 (29 - 55)

第二部分

亲情友谊托飞鸿(信稿) (56 - 91)

第三部分

来信和赠诗 (92 - 100)

感受益多情愈深

代序

我的第一本诗集《小草吟笺》出版后，又编印了《小草外集》，这都是在韦晓萍先生鼓励、指点和帮助下完成的。饮水思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写有《学无止境 师德难忘——敬谢韦晓萍老师》一篇记叙文，表达我对老师的一点感激和崇敬之情，先是印出单行本 100 本，继而又编入《小草外集》，列于全书前头作为第一篇，印了 510 本，分送各亲朋诗友，以为纪念。亲友对此反映较好，从反馈回来的意见，有说这篇文章虽然是长了一些，但内容丰富，综合力强，可读性高。我个人却以为还不算长，也不够丰富。因为韦老的为人师表，道德文章，决不是几千字就能写得完的，也决不是一篇记叙文章就能表达够的。韦老在我的心目中，好像巍巍山岳，浩浩江河，在他的精神上、言行上、品德上，有我毕生学不完的东西，也是我毕生学习的源泉。每当想起我的老师韦晓萍先生，我就有了学习的榜样，有了学习的方向，全身就有劲，笔底也来神，我就动笔来写，不管写得好或是写不好。在继《小草外集》出版以后，我还要继续写下去，写我的思想，写我的感情。我的思想，我的感情，又都凝聚着对我的老师的崇敬、景仰和铭记，永不能忘。现在《小草新编》就这样的写出来了。

有了真情实感，文章就不怕写得长；写得长的文章，就要有真情实感。所以，我的这篇长文，就用了一个题目，叫做《感

受益多情愈深》。我除了写自己的感受之外,还引用了韦老的老友、学生和他的家里人的有关记叙他的文章,他们对韦老都很熟悉,也很尊敬,他们写的都是真实感情。这样的文章反复读,反复受益,越读心越亮堂,越感到有一种发奋图强的精神力量!

认识这样一位老人、名人

我的老师韦晓萍先生,是个最受人尊敬的老人,我有幸亲聆他的教诲,算是最大的福气。2000年6月10日在柳州诗词曲学社聚会时,我在赠书发言中讲了这样几句话:“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在古稀之年能亲聆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韦晓萍师长教诲,是我一生中最大幸福,也是我一生中最大、最佳机遇。”这是出自内心的老实话,句句是真,字字是情。

我原先不认识韦老,但久闻其名。直到1997年秋,经挚友曹国侯同志介绍我入柳州诗词曲学社,我立即填表,并抄了几首拙作送去。不久,就得韦老的亲笔信,讲我写的诗不错,有根底……。好似一股暖流,通向全身,我的心里热呼呼的,毕生难忘。同年10月,学社组织社友往忻城访问,我也参加了。这时得与韦老会面,又听了韦老《漫谈学诗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他说,我们讲诗,主要讲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唐诗、宋词、元曲中的诗,即一般人称之为旧体诗。不谈新体诗,也不讲“俗文学”。韦老讲传统诗,他引用了《红楼梦》第28回中的一段故事,总结为写诗先要意思讲得通,再要押韵,还要雅一点,三者必须统一起来。他讲得通俗易懂,又插入许多名诗趣词,妙语横生、深入浅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为了容易记,

把它浓缩成 4 句,题在《小草吟笺》诗集首页:

传统诗词漫启予,文通平仄莫含糊。

调和韵律修辞美,治性陶情尽是书。

这第一次与韦老见面,他对人热情,随和,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毫无一点“名人”的架子,接近他的人都感到很轻松愉快,好像对最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忻城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韦老,他们也与我有同样的感受。有一位马亚中老先生就写了一首“藏头诗”,祝“晓萍先生健康长寿”表达他第一次见到韦老的景仰心情,诗曰:“晓径寻芳聚县城,萍踪巧遇喜盈盈。先传诗好文尤好,生说法精艺更精。健捷有才三德重,康宁无欲一身轻。长思古训勤为本,乐共骚坛仔细评。”还有一位恭城的朋友朱皓先生写他最初访见韦老的时候,也用充满崇敬赞颂的口吻,表达他的庆幸说:“八四云然赞老成,老当益壮祝长庚。人如日曜中天灿,品似江流大地莹。博学有才非妄语,广交无憾注真情。我来访见实称幸,犹坐春风百念清。”又如柳城县的谭旺松先生,他写的第一次见到韦老“喜赋:”“徒步跨州访伯牙,赫然自愧是樵家。先生不弃南针指,如坐春风满地华。”从这些诗中,可见大家都对韦老“一见如故,”也“一见倾心。”所以,我说能认识韦老是一生的福气。

随后,我得到一本韦老的巨著《雪泥诗剩》,再三捧读,受教良多。在该书中有梁景梅女士的《编校后记》,介绍韦老的情况很详细,其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说:

“对于韦老,无论识与不识,闻名心仪,对于他的才学及人品,未有不敬佩的。但是,真正了解韦老的人并不多,因为他很少涉足交际场合,谢绝一般应酬,人们只从他在报上常发表文章而熟悉‘韦晓萍’这个名字,(这是他的笔名),看到他那清

丽的文字和颇富女性化的‘芳名’，还以为是一位女作家。据知有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信封上就写着：‘韦晓萍女士收。’更有一位多情男青年把他当作追求的对象，写信向他表示爱慕之情，一时传为佳话。我是近年一个偶然机会认识韦老的，他使我惊奇，也使我心折，就是这样一位恂恂的长者，对之如接霁月清风，令人鄙吝全消。我自感有幸能得成为他的私淑弟子。”

梁女士是柳州市的女作家、女诗人，已出有书，她的作品《情在山水间》由韦老作序，很受读者欢迎。她都自感到有幸能成为韦老的“私淑弟子”，我怎不感到能受到韦老的教诲，是一生中最大的福气，也是毕生难得的机遇呢？

从“背影”看到登山的脚步

从那以后，我多次在学社聚会时与韦老接触，也更多的了解到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品德。1999年5月14日的《柳州日报》登有一篇《老爸的背影》，作者韦小惠是韦老的小女儿，她写出韦老的生活情况是：

“老爸几十年来一直伏案工作，他的背越来越驼了。从他的背后看，好像驼得很厉害，完全是老了。只是他自己常常要勉强挺起腰杆，表示自己还不驼，还不老，还挺有精神。如果从精神来看，老爸确实不老，绝不像个八十岁的老人，他还有敏锐的思维，灵活的头脑。想问题，写文章仍旧不减当年。他是搞文史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前，家里还保存着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他的信，只是在‘文革’中信被毁了。老爸每每提起来就感到痛心。他把范老先生信中写的‘做事要从小事做起，想问题要从大处着眼’当作座右铭。每当他为写那些关

系大局大事的文章而研究问题时，查根据，翻遍所有有关书籍。他一点也不嫌累，就这样天天翻书，天天写，天天仆在书桌上，背也越仆越驼了。”

又在 1999 年 4 月 29 日的《柳州日报》上，我还读到一篇《我的公公爱登山》，写这篇文章的署名张献娟，原来就是韦老的小媳妇。她写得很有趣，也正是韦老的生活情趣，你看：

“我的公公今年 83 岁，最近他去金秀大瑶山登上了圣堂山顶。圣堂山海拔 1979 米，山路长 2000 米，他又上又下，走了 10 个小时，居然不跌跤，不叫累。我的公公一头银发，满脸红光，精神焕发，讲起他的登山经历就像得了奖的小学生一样高兴。只有一家人听了为他担心，婆婆说：‘早晚得你去登这样高的山，我是不让去的，要是跌下山怎么办？’

公公听了，哈哈笑了，说：‘那怎么会，我又不是一次两次登山，有经验嘛。’他老人家说对了，登山是他的爱好。他登过泰山、庐山、华山、崆峒山，柳州附近的山没有那一座他不上过。他的身体很好，脚力很健。每天一清早起来就到街上漫步，走呀走呀，大概走一个多小时，合计 5 公里左右，然后就去上班，天天如此。他常对人说：‘漫步街头，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有机会，就要去登山。’

公公养生之道原来是这样简单，他是自得其乐。对于吃穿住从来不多讲究，越老越随便过日子，家里煮什么他吃什么，每餐饮一小杯酒，有一小碟花生米嚼着，他也很满足了。照他这般年纪，早就应该享清福了，我们做子女儿媳的，也常劝他少做些多休息，他却说：‘老人要多动脑，脑子灵活才不患痴呆症，要为社会多做点事，不要白白虚度一生。’”

韦老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老人。他家里儿女晚辈非

常敬爱他，社会上认识他老人家的也都觉得他一家人很幸福，他老人家晚年过得很充实，也很好，很潇洒。在《广西诗词学会通讯》第32期里，登有一篇文章《柳州一次“空前”的诗集首发式》中写有这样一件事：

“在由韦老主编和总纂的《柳北区志》出版，举行首发式时，柳北区政府领导发给他一笔奖金。韦老当场接过一个大红封包，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奖金我心领了。请领导代我转送去灾区。”有的人见他这样，还向他说，“你也不看看奖金有多少？”韦老很幽默地答：“看了就想要了。”使听的人都好笑起来。韦老的为人真像雪一般洁白，在他的诗中处处显露出那种雪洁的清气和高韵。有一些老诗人评说：韦老“诗如其人。”他为人平易近人，他的诗也是平易好懂，又一位长者评论说：韦老是“诗，从平淡中见新奇；人，在贫穷中显富贵。”柳州市诗歌协会会长金彦华先生评论道：韦老“人品诗品皆佳”。有位黄相严先生诗赞韦老，说他是“荣辱不惊坚逸志，钱权无意活神仙。功夫百炼人人颂，才具千钧处处传。”湖南衡阳的沈光荣先生也有诗赞颂韦老：“先生妙笔万般高，处世何曾为折腰。山水有情原性洁，钱权无意自名高。敞怀可对天和地，寄兴尤传风与骚。德劭年尊人独好，夕阳红照更妖娆。”

今年我参加柳北区政协文史座谈会，得到一本《柳北文史》第十四辑，读到其中盘武明同志写的《耐雪凌风松更苍——记柳北区政协委员韦晓萍》一文，他在文章中分写4个小题：（一）一位勤奋工作的方志学者；（二）声誉很高的文史工作者；（三）众口尊称老师的著名诗人；（四）一位赤诚的爱国民主人士。文章记述韦老早在40年代即是国内外著名的新闻记者，被当时人誉为“名笔八刀”。在临解放时，他拒绝随往台湾，谢

绝在香港定居，也不留在新加坡工作，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后来在国内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历经磨难。但他无怨无悔，爱国之心不改。文章中还记有“前年有台湾朋友来柳探望，对他（韦老）说：‘你当年要是跟我们一起去去了台湾，官一定比我们做得大，钱一定比我们捞得多。’韦老回答说：‘我爱自己的家乡，生活在大陆，在祖国母亲怀抱里，心里踏实，我一生无怨无悔。’充分表达了他的一片爱国赤诚。”对于这样一位爱国老人，《广西日报》、《桂中日报》、《柳州日报》、《鹿寨报》和《广西老年报》都有专访文章介绍，广西电视台、柳州有线电视台都有他的录相报道。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有关他的采访实况。韦老是柳州著名的文化老人、广西健康老人。在国内甚至香港、台湾都有名。

一篇翔实小传和四句评语

韦老的道德高尚，性格开朗，气度豪放是我们学不完的。我每次和他老人家叙谈，什么乌烟瘴气都散了，就好像年轻了几岁。我也常常读他的《小传》，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他的《小传》附载在《雪泥诗剩》后面，现在照录于后，作我学习的课本。传曰：

“韦晓萍，谱名楫蕃，字用济，以号行。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九日生于中渡县安安乡寨上村（今属鹿寨县）壮族家庭。幼承母教，口诵唐诗，十一岁作绝句，为父赞许。十四岁，入桂林桂山中学，被选为学生会委员、班刊主编，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十六岁编著《中国地理表解》一书，由桂林典雅书局出版。一九三七年人武昌中华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肄业，后毕业于中原大学政治学院。

抗日战争初期，任汉口《奋勉周刊》编辑，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发表抗战文学作品，译著有《日本经济解剖》，创作《馀生》、《血辙》等小说，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一九四零年入川，到巴县任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研究员兼实验学校主任。一九四一年受聘为中国茶叶公司西北分公司业务考察专员，遍历陕甘、青、新、内蒙诸省，著《边政与边茶》一书。一九四二年底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以“异党嫌疑分子”在兰州拘捕监禁。两年后解往重庆，经保释出狱，任香港《天文台评论报》渝版总编辑、《民语报》总主笔，自办《褒贬周刊》任社长兼主编。结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及国民党高层人物吴稚晖、梁寒操、陈立夫、张道藩等人，深得于先生奖掖，亲笔书赠“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条幅为勉。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到南京任《建中周刊》主编，旋应聘为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科荐任一级（县级）干事，《文艺先锋》月刊编辑，曾获一等忠勤奖、全国出版论文征选第一名。创作长篇《黄河之水天上来》，中、短篇《风箱峡》、《黑货》、《穷巷里》、《年关》等及散文《袅娜集》、诗词《蟹簖集》。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理事兼组织组长。一九四七年任新加坡《总汇报》特派员、《广西日报》驻京记者、济南《山东新报》特派记者、徐州《正义日报》特派员。先后使用各种笔名三十四个，其中常用有萧屏、汪洋、孟克、卢弩、吕剑、林朗、韩家隽、余公敢、余继昶、刘枯生、伍传仁、苏衍伦、黄惠夫、黄谷胥、钟度瀛、陆载仁、司马宓、练敏公、韦颖祖等，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

一九四八年八月，到济南任《山东新报》（省级）总编辑兼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部军简三阶（少将衔）秘书。同年十二月，南返桂林，任《广西日报》总社主笔、副刊编辑主任，《新闻

观察》周刊总主笔。一九四九年六月，任《广西日报》华南特派员到广州，拒绝随国民党往台湾，谢绝定居香港、不赴新加坡工作。毅然转回桂林。十一月任《广西日报》桂林分社社长，受聘西南法商专科学校教授。桂林解放时，保护广西日报社不遭破坏，旋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政治部派随军下地方工作。一九五零年一月，被推举为中渡县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大会主席，为恢复地方革命秩序作出贡献。同年十月，调任柳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学委会主任委员、中苏友协宣传组长，两次评为乙等功臣。一九五三年，在政治运动冲击下，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留场就业，历尽坎坷，但无怨无悔，爱国之心不改，著《新世说》八卷，“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转业回到柳州，后以爱国民主人士身分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柳州市柳北区委员会委员、文教卫委员会副主任、文史资料工作组组长、《柳北文史》主编。历任四届十四年，年年受奖。

一九八六年受聘主编《柳北区志》，历时七年完成，柳北区政府发给奖金，一文不取，当时全部捐去赈灾，受到社会上的赞扬，《广西日报》、《广西老年报》、《柳州日报》均有专访报道。柳州有线电视台曾连作专题录相：《呕心沥血写区志》、《老报人——韦晓萍》、《韦晓萍的文化情》等，向社会广为介绍。一九九四年出版《雪泥诗剩》一书，流传到香港、台湾等地，并多次为柳州山水园林景点撰题诗联。先后被聘为柳州市楹联函授院顾问，励进诗社顾问、融水县玉融诗社顾问、忻城诗联学会特聘顾问、柳州诗词学会顾问、柳州石文化学会顾问及《鱼峰区志》特聘总纂、《城中区志》总纂、《柳郊文史》特聘执行主编。被推举为《柳州诗词》主编、柳州诗词曲学社社长。又参

与《柳州市志》(稿)评议工作,编成《柳州市民俗志》。曾被评为柳州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柳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柳州市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柳州市柳北区十佳文明市民、广西健康老人。

生平事迹分别载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当代中华诗词家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大辞典(华人卷)》、《中国民间名人录》、《鹿寨县志·作家艺术家名录》、《柳北区志·文教系统人名录》、《世界华人艺术界名人录》、《世界文学艺术人才纪录大全》和《中国韦氏通书》。”

从《小传》可以看到韦老的一生。有位江苏省的诗友读完韦老的小传,他用4句话称赞韦老是:“少年聪颖,青年得志,中年坎坷,老年勤奋。”一句也不错,我对韦老的老年勤奋最受教育。

勤奋不息,九死不甘负此头

在《鹿寨报》上,我看到有一篇介绍韦老的文章,题目就叫《老当益壮,勤奋不息》,韦老写有诗句道:“皆因所善终无悔,九死不甘负此头。”他老人家的勤奋精神,永远激励我也发奋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作诗一首《敬谢韦晓萍老师》曰:

诗成一卷兴偏豪,倍感心潮逐浪高。

敬谢吾师施教泽,亲沾雨露润枯苗。

此诗载在我的诗集《小草吟笺》末页,是我亲受教益的心声。社会上提到韦老晚年勤奋的话,逢到熟人就可听到,报刊上写到韦老的勤奋动人事迹也不少。由柳州市政协编印出版的《柳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党的统战政策光辉照耀下的二

十年》一书中，登有一篇《八十正当年，彩霞尚满天——记柳州著名文化老人韦晓萍》的文章，写他在 1998 年“已 81 岁高龄，但老人神采奕奕，身体健壮，思维敏捷，每天仍能写作 2000—3000 字的文章，在他退休的 21 年里，退而不休，笔耕不辍。他编写出版柳州市第一部 40 万字的《柳北区志》，在此期间，不慎跌伤右臂，为了不影响修志，学会左手写字，坚持 7 年，终于完成。后又受聘总纂了《鱼峰区志》和《城中区志》，写出了《柳州市志、工业志》的柳北区章，受到市、区两级奖励。他主编了 14 辑《柳北文史》，发表 120 多万字的史料文章，又受柳州市郊区政协特聘为《柳郊文史》执行主编，他为柳州市的编修史志工作和保存史料，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像韦老这样勤奋著述的事迹，根据《我的公公爱登山》那篇文章里写到的：韦老在 70 岁时编成 40 万字的《柳北区志》，83 岁又总纂《城中区志》，还主编《柳北文史》，又编成 12 万字的《柳州民俗志》和着手写 60 万字的《民国旧事》。真是的，一个 80 多岁的老人，不知那里来的这么多精力？我们做后辈的都自愧不如。韦老说：“这没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做到老，能为社会做点事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他到现在仍旧天天上班，而且总是走着上六层楼的办公室。我每次去办公室找他请教，走上那六层楼都感到气喘，亏他老人家每天上上下下几次，这要有健康的体魄，宽阔的胸怀，更重要的是还有一腔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大家一提到韦老勤奋著述，总离不开讲他修志的成果，他是很有研究的方志学者，他不仅是柳州市第一部区志的主编和总纂，就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也是第一位城区志的执笔

人，而且一干就坚持下来。他在《柳北区志》出版时写的诗中，有句题道：“七载书成贯始终，坚持到底足称雄。”又说：“毕生无怨亦无悔，一志修成万事休。”他又不仅是只修成一志，在柳州，还有《鱼峰区志》和《城中区志》，也是由他负责总纂。柳州市内有4个城区，其中3个城区的区志，都灌注了韦老的心血。在南宁首府举办的广西新编地方志展览中展出的图片，有一幅韦老人个人的工作照，看他白发苍苍，挺有精神的坐在办公桌前，聚精汇神的提笔改稿。这幅照片刊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区通志馆承办的《广西新编地方志展览》第149页上，照片下面的文字写明是：“现已80余高龄仍在城区从事文史工作的韦晓萍先生是3部城区志的总纂。”这在广西修志界是少有的，也许就是第一个，就说在国内整个修志队伍中也是难得多见的。这是他老人家的光荣，正是勤奋的结果。

严肃认真，对社会对后人负责

韦老修志治史，不仅勤奋，更是严肃认真。他常说：“这是要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事，决不能凭个人主观胡说霸道。”今年在《鹿寨报》出现的一场争论，最能表现我的老师认真负责的精神。4月间，他在老家村民中发现壮族诗人韦麟阁的《小舟别墅遗集》原本，收藏近100年之久。韦老非常珍视，认为这一发现，可为《广西壮族文学史》增添一笔，本着繁荣壮族文学这个愿望，他特为《鹿寨报》写了一篇短稿，介绍这次发现和这位壮族诗人的遗集。4月24日，有署名“诸葛芳”的人在《鹿寨报》上登出题为《是壮族诗人还是土豪劣绅》的文章，对死人踩上一脚，抬高自己，否认韦麟阁是壮族诗人，完全

是用阶级斗争那一套来评论人物，引起社会上不少人的反感，纷纷投书给《鹿寨报》，批评“诸葛芳”的荒谬。我也写了一篇短文给《鹿寨报》，讲了我的看法，认为“攻其一点，否定全盘”的极“左”做法是不对的。韦老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从广西壮族文学史看韦麟阁是地地道道的壮族诗人”写了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诸葛芳”的文章题目就不通，“还侈谈什么‘文以载道’，倒真是‘言行相背，口是心非’（引用“诸葛芳”的原句）。韦老说他是“牛头不对马嘴。明知其为人如何，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治史、修志，评骘人物的态度问题。”韦老是从对社会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治史，修志精神来评论这个问题。他指出：

诸葛某人自己承认孤陋寡闻，他不仅没有看过《小舟别墅遗集》，更没有看过《广西壮族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中，韦麟阁名列其内，所载“忧时念乱，声情激越，”也是文学史中对韦麟阁作品的评语。韦麟阁是广西壮族文学史中的一名壮族诗人，这是肯定的。《小舟别墅遗集》的发现，更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的确是可为广西壮族文学史增添一笔。

作为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的特定人物，韦麟阁的一生，在清朝时受过诰封，是个封建官僚，‘七子十六孙，为秀才，为知事，为营长警官’，被人奉承为‘富贵寿考’，这是事实。他勾结官府，镇压农民，被人挖了祖坟，也被人骂了一辈子，至今还有人在骂，这也是事实。荣辱褒贬，事实俱在。但并不影响他作为广西壮族文学史中的壮族诗人这一事实的存在。

韦老举出周作人、胡适二人为例，说明周作人的晚节不终，当了汉奸；胡适长期混迹国民党官场，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新文学史中的已有评价，韦老以史志学者的眼光指出：

对韦麟阁的看法，也应一分为二，扣上一顶‘土豪劣绅’的帽子，难道就不允许他成为壮族诗人吗？

我的老师韦晓萍先生对这个问题，更深进一步阐述道：

“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评骘人物注重事实，不扣帽子，特别是修志，强调述而不作，不凭主观妄议。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事。极‘左’思潮的影响，仍然消除未尽，在诸葛某人的身上就充分体现出来。奉劝他先去读一读《广西壮族文学史》，就会自己找到答案。韦麟阁是地地道道的壮族诗人，绝不是‘土豪劣绅’4个字就能完全否定得了的！”

听到传出来的消息说：那位化名‘诸葛芳’的人得知韦老的文章，赶忙到报社去磨了一个下午，请求不要发表，以保全他的面子，可见韦老的文章，足以震慑心术不正的人，不论化为什么名字，也心虚见不得人，这已成了鹿寨街上人茶余酒后的一场笑料。

柳州有座雀儿山，曾经误写为鹊儿山，雀与鹊两字混用，地以山名，雀儿山附近的北雀路，雀儿山路或雀山公园也被错写成北鹊路、鹊儿山路或鹊山公园，地名混乱，给邮递造成不少困难，也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柳州市地名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找到我的老师韦晓萍先生，请他论证究竟是“雀”还是“鹊”。韦老从地方志和有关史料研究，提出“为雀儿山正名”。1986年，柳州市人民政府就下文正式规定“雀”字为此处的地名用字，通知所有机关、单位、街道、商店的招牌、门牌、公章，凡有用“鹊”字的一律改为“雀”字。但有一个人，为了表现自己，还联络一些人趁着去年柳州市党政调整领导班子，新领导新任不久的时候，他们建议恢复“鹊”字，把雀儿山再改为“鹊

儿山”。提出的理由：一是说：“鹊”字是“古称”，并举出清雍正、乾隆的几部《广西通志》记载“鹊山”为证，认为恢复鹊山古称，才能显出柳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面貌；二是说：喜鹊是吉祥之鸟，麻雀曾经与老鼠、苍蝇、蚊子列为“四害”，名声不好。所以他们认为应废“雀”字，用“鹊”字为好……等等，这个问题又找到韦老，请他老人家提出意见。韦老又是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对政府要多帮忙，少添乱，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他又从修志、治史的角度，找了很多资料，明白的指出：把“鹊”字当成雀儿山的古称，其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无知；至于说喜鹊是吉祥之鸟，近乎封建迷信，更是荒唐可笑！

韦老举出的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指出：柳州雀儿山之名，最早见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7年)印行的《寰宇通志》一书中，距今500多年，当时并无“鹊山”之称，也无用喜鹊的鹊字写的鹊儿山，明代记载雀儿山比清代几部《广西通志》和《柳州府志》出现的鹊山的记载早300多年。韦老还举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黄诚沅等人编纂的《广西通志》(稿)记载的：“鹊山，郡之主山也，古名乐山，俗呼雀儿山，在柳州市北约十里，形如雀儿，北向昂首振翼。”这是经过修志人员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鹊山就是雀儿山，没有另外什么鹊儿山。韦老特别指出：柳州市政府早已下文将鹊字改为雀字，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建议，又将雀字改为鹊字，出尔反尔，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岂不是专为政府制造乱子，而且所谓恢复古称，也不符合史实。韦老还举出柳州的马鞍山古称仙弈山；箭盘山古称屏山；鱼峰山古称石鱼山；鹅山古时写为峨山。若照某些人的建议，是不是都要改成古称，才算显出柳州的历史面貌，否则，柳州就不是历史文化名城了吗？我的老师提出的